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 学术通讯 ——

2009 年 11 月（总第十五期）

Fud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 2009. 11 —

E-mail: ias-fudan@fudan.edu.cn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 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目 录

一.学术成果.....	3
1.刘清平：儒家民本思想：工具性之本，还是目的性之本.....	3
2.陈润华：谁的外省？哪种风俗？.....	3
3.孙国东：超越“新自由主义范式”的理论准备.....	3
4.邓正来：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评Colin Sparks《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	4
二.学术讲座.....	4
1.复旦文科科研处与高研院举行第十二期“通业青年讲坛”.....	4
2.复旦高研院举行第十一期双周学术午餐会.....	7
3.秦晖教授主讲“警惕‘问题殖民’：西学东渐中的问题误置”.....	10
4.Christopher J. Berry教授主讲“亚当·斯密的道德经济学”.....	13
5.Gustaff Geeraerts教授主讲“中国与新的多极秩序”.....	16
5.Luk Van Langenhove教授主讲“为提升社会科学与社会的相关度而迈向一种新的关于社会科学的本体论”.....	18
三.学术来访.....	21
1.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drew MacIntyre教授一行来访复旦高研院.....	21
2.莱斯大学Steven W. Lewis教授来访复旦高研院.....	21
3.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校长帕特·沃尔希教授一行来访复旦大学.....	22
四.学术出访.....	23
1.郭苏建教授出席中联部举办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发展模式的改革与竞争”.....	23
2.高研院参加“东方现代文化观念创造及其对全球的影响”国际高层思想论坛.....	25
3.纳日碧力戈教授在贵州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演讲.....	25
4.邓正来教授参加“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学术研讨会.....	27
五.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	27
1.复旦高研院举行第二次“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	27
六.慧园鉴赏会.....	29
1.复旦高研院举办第一期慧园鉴赏会.....	29
七.学术信息.....	30
1.“邓正来教授新著出版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学术研讨会”简报.....	30
2.邓正来教授新著出版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学术研讨会会议程.....	37

一. 学术成果

1. 刘清平：儒家民本思想：工具性之本，还是目的性之本

选自《学术月刊》2009年第8期（总第483期）第52-58页

摘要：无论是周公的民本观念，还是儒家的民本思想，都不包含民主思想的萌芽或精华，因为它们归根结底不是把民众视为君主、官员理应在治理活动中予以尊重的“目的性之本”，而主要是视为君主、官员巩固自身统治不可或缺的“工具性之本”。两者间的本质差异在于：“目的性的以民为本”是把保护民众利益、关心民众福祉自身当作终极价值，“工具性的以民为本”则是把保护民众利益、关心民众福祉当作维持君主统治的有效手段，因此在精神实质上有着天壤之别。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儒家的民本思想是工具性而非目的性的，它在历史上产生种种正面效应的同时，又由于自身蕴涵的内在悖论导致了一些严重的流弊，并且与现代的民主精神格格不入，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阻碍现代民主建设的负面作用。所以，只有通过创造性转化，把儒家的工具性民本观念改造成目的性民本观念，才有可能对现代民主建设产生正面效应。

关键词：儒家 民本 工具性之本 目的性之本 民主

2. 陈润华：谁的外省？哪种风俗？

原载于《上海文化》2009年第6期

选录：对普遍沦入后现代处境的当下，面对所有人变成精神上的孤儿、成为自恋狂的现在，我们不妨回顾博尔赫斯说过的：“我们应该把宇宙看作我们的遗产，任何题材都可以尝试，不能因为我们是阿根廷人而囿于阿根廷特色，因为作为阿根廷人是预先设定的；在那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我们总是阿根廷人，另一种可能是作为阿根廷人只是做作，是一种假面具。”一方面，在很多人那里，做作的假面具、一个相当坚硬的“外壳”就是以特色自号、并堂而皇之地出现的。另一方面，博氏这个提醒，在我们的生活受历史主义的“现代”支配、唯有虚无的物质主义、唯剩下膜拜自己肚脐眼上下五寸的当下，倒是个奇怪的讽喻：不仅苦苦追求的“特色”难以找到，要把“把宇宙作为遗产”，把所有过去、当下和未来都当作我们的精神故乡，——根本上是我们写作最紧要的态度，——也变得相当奢侈。

3. 孙国东：超越“新自由主义范式”的理论准备

《科学时报》2009年11月12日B3版

选录：显而易见，若想超越哈耶克理论甚或“新自由主义范式”，我们必须进一步开展对哈耶克理论及“新自由主义范式”的批判性检视，甚至要建构我们自己关于社会秩序之正当性的规范性理论。但这仍是邓正来目前问世的所有论著中尚未涉猎的题域。在很大程度上讲，这也是他在当下中国思想界经常被“误置”的原因之所在：由于是中国最权威的哈耶克研究者之一，他常常被误认为是“哈

耶克主义者”，进而被纳入当下中国“新自由主义”阵营之中；由于其晚近以来对“主体性中国”和“重新发现中国”等的呼吁，他又是“新左派”阵营乐于亲近的学者。无疑，除了我们要对他保持善意的理解外，这都有赖于他本人以更系统的论著作理论上的澄清。邓正来目前对哈耶克的研究成果让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期待。

4. 邓正来：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评 Colin Sparks 《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

原载于《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 年第 10 期（香港中文大学）

摘要：超越 Colin Sparks 《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历时性学术史梳理在时间维度上的规定性并超越发展传播学本身的学科局限，本文将该书论题转化为更具一般性的、对一种新型全球化话语的理论建构；同时，在梳理该书理论建构之内在理路的基础上，依据作者以「世界结构」为背景所主张的基于「主体性中国」的「开放性全球化观」对该书进行了批判性的检视。

关键词：发展传播学；世界结构；主体性中国；开放性全球化观

Abstract: Transcending both the periodisation confinement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y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s encapsulated in Colin Sparks'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Mass Media* (2007), this paper aims at a more general construct to theorize a new discourse on globalization, by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of the book with a view of 'Open Globalization' based on Chinese perspectives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structure'.

Key Words: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World Structure; China as the Subject; A View of Open Globalization.

二. 学术讲座

1. 复旦文科科研处与高研院举行第十二期“通业青年讲坛”

2009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2:30，由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联合主办的“通业青年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 2801 室高研院“通业大讲



堂”举行第十二期讨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敬义嘉博士，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讲师刘小平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吴冠军博士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教授、日本研究中



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郭定平教授担任点评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主持本次通业青年讲坛。高研院研究人员郭苏建、沈映涵、刘清平、孙国东、林曦等也参加本次讲坛。许多校内外的同学和老师也来到了讲坛现场。

首先，邓正来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出席讲坛的演讲嘉宾以及点评嘉宾，对嘉宾和听众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为三位讲演嘉宾颁发了高研院通业青年讲坛演讲嘉宾聘书。



其次，主讲嘉宾敬义嘉首先介绍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学科背景，接着做了题为“合作治理中的政府能力建设分析框架”的报告：第一，敬博士从美国监狱民营化的过程谈起，指出政府民营化大致可分为资产民营化和服务民营化，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后者可以看做是合作治理的方式，那么政府如何通过合作给予的服务提供这一能力建设问题就凸现出来了。第二，政府能力建设的分析框架主要通过两个维度来构建的，一个维度是在政府管理这样一种合作治理中表现出其行为的目的，可细分为目标获取（提高效率、减少支出、提高管理灵活性、缩小政府）和风险控制（在合作治理过程中一些人和组织的利益会收到损害，如何来避免这些消极效益的产生，避免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政治的社会的反作用力，避免国家的合法性收到损害）；另一个维度是对于风险的定义，即政府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系统的风险（在做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中，单个组织因为自身的资源、管理能力而可能出现的诸如合同书写错误、没有能力监督、未寻找到最优合作者等一系列问题）和非系统的风险（政府和政府外的组织的合作过程中，由于政治经济的一般性条件而面临的风险），进而据这两个维度可以区分出四个管理方面——合同管理、市场与社会赋权、社会平衡和合法性管理。其中，就利益成本而言，可能存在的问题有腐化、消费者利益损失和政府雇员利益的损失等等。第三，针对中国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合作民营化把新的能力引入进来，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如果合作引入过深将对现有政府秩序形成挑战。另外，敬博士提出了“如何在中国创造条件使得社会组织发展起来，政府如何做到最佳退出”等问题。最后，他指出在做这些研究过程中，自己曾和“世界民营化大师”萨瓦斯教授做过讨论，并已经将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公共行政评论》的最新一期。



主讲嘉宾刘小平做了题为“‘法律信仰论’之初步反思——从对伯尔曼理论的中国接受谈起”的报告，他指出自己研究渐渐从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转向当代中国呈现出的实质性问题，主要从四个方面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第一，对伯尔曼理论在中国的实证影响进行考察，将伯尔曼与博登海默和波斯纳相比较。在中国法律界，大体上，伯尔曼的法律观点已经被接受，博登海默的法理学常被片面引用，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分析处于译介阶段；第二，探寻这些影响背后的实质，揭示出影响存在的三个悖论：接受的背离，即相对于伯尔曼主张法律联系历史，我国接受法律信仰这一一般性的命题，却常出现

法律拒绝历史的现象。法律观的背离，伯尔曼的整体法律观，法律是一个自觉有机的发展模式，国内存在的是孤立的建构的法律观，表现为试图建构法律人法治的乌托邦，强调法律与道德、政治的分离。有根的法律和彻底的虚无、彻底的功利主义的悖论，伯尔曼反对的是无根的法律，中国的法律信仰多带是一种功利的现实的取向，以有效性来评判一切，陷入法律工具主义的迷潭。第三，对中国在接受伯尔曼理论出现的背离进行原因分析。从观念上来看，一方面是由于人治和法治的简单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则是普遍主义的缺失。第四，对法律信仰论问题进行反思和重构。借助邓正来教授提出的全球化的强制支配性和强制建构性以及现代性的普遍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参照性认识框架，进一步追问“寻求的是什么样的信仰”、“信仰从何而来”、“信仰的基础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法律信仰论尚需要更多地尊重和展现活生生的历史，并回到现实中国的实质性分析，从而方可展开非平面的、富有想象的、深入问题实质的研究。

主讲嘉宾吴冠军做了题为“等待外星人——全球资本主义与政治的主体”的报告，主要谈论了三个问题：第一，区分了左中右三种政治哲学，分别是以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研究的规范性政治哲学，研究规范或价值的正当性或可欲性；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在西方属于边缘的政治哲学，是一种协调哲学与社会之间关系以使之和谐的知识；法国、意大利的所谓存在论政治哲学，讨论马克思留下來的改变世界的问题，解决真正突破既有秩序的政治行动这一可能性问题。第二，揭示资本主义的变态逻辑——“为了实质性地帮穷人，就不能直接救助穷人，而是把钱拿去给富人，只有他们继续大发其财、金山不倒，穷人才能获得相对而言较为长期性的生活保障”；指明全球化的核心问题——“资本的空间性修复（这个概念本身是援引 David Harvey）的潜力已逐渐趋向枯竭”；基于上述两点，吴博士指出真正作为公平的正义，必须彻底越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矩阵去寻找，并开创全新的起点。第三，关于当代政治哲学的论争核心，即政治的主体问题，选取三个理论路向：哈特和奈格里；拉克劳和穆芙；齐泽克和巴迪欧。三对人物背后的理论资源分别较多地来自马克思和德勒兹、马克思和格兰西、马克思和拉克。吴博士接着详细分析了他们争论的焦点，并对政治主体性的连贯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嘉宾演讲结束后，听众们提出了很多问题，这里摘要列举如下：西方国家和中国在合作治理的改革所处阶段、方式方法、动机目的、操作机制等方面主要有何异同，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法的工具主义的理解方式对于法律信仰本身有何影响？弱者战胜压迫他们的强者后成为新的强者，继续压迫新的弱者，这套机制、程序和规模的现实并未改变，这个问题如何理解？通过对法学界经典文本的分析研究而建立的知识法学是否有可能指向了文本本身的批判，而忽略了指向社会的批判研究？是否会被忽略法律的社会—历史维度？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全球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机制，我们究竟如何展开马克思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撇开不同国家差别的具体语境，公共服务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和正当性是怎样的？从新公共管

理这个角度，警察和军队是否可以运用市场化，为什么？相对于国家主权，管理的限度在何处？您的研究是否显示出政治就是斗争，就是革命这一观点？如何面对公众宣传学理上理所应当的价值？如何证明中国所谓法律信仰论者已然接受了伯尔曼的理论？政治主体是否可以消除产生它的逻辑，如何消除？方式本身是否必然成为目的？等等。

接着，郭定平教授做了详细的全场点评。首先，高度评价了跨学科的讨论模式能够使得大家思维活跃起来，例如在讨论中提及的军队市场化问题可以联想起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的费用分担问题，这可以看作日本将其国防进行了外包，从此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体现出了创造性。其次，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们期盼幸福生活这两个角度，强调政治学的探讨目的在于“使得人们在健全的社会中过美好的生活”，人的整体性和基本问题的一致性各学科探讨的最佳基础。再次，引用《罗素自传》中“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而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一说法，指出学术研究均建基于人类的最基本问题，均有对人与社会的关怀。复次，针对敬义嘉的报告，结合日本邮政民营化和中国民营化的现状等例子，指出民营化概念是复杂且含义丰富的，随国别地域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进一步讨论可能还需要严格界定概念。国家作为主体它与社会上的其他主体是非常不同的，这一特殊性还有待更为深入的讨论。针对刘小平的报告，指出法律信仰论还需要回答“为什么说中国接受法律信仰论”、“由谁接受”、“接受到什么程度”、“有什么表现”等问题，研究过程中要严格遵守逻辑自洽。针对吴冠军报告，郭教授着重阐述了政治哲学的反思意义，并指出先解决改革方案的依靠对象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最后，主持人邓正来教授再次代表高研院向到场的所有同道表示了感谢，指出三个报告均具有对现实的深切关怀，任何一个我们所主张的方案到底是对过去错误的纠正还是对过去错误的根本性的颠覆，这会带来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如果只是一种纠正的话，那么这基本上只是在同一个层面上在看问题，只是对现有逻辑的进一步捍卫，如果是颠覆的话就有可能开放出一种新的逻辑。这个很前提性的问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通业青年讲坛每月举办一次，每次邀请来自复旦大学以及其他院校的三、四位不同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担任主讲嘉宾，分别做二十分钟的学术报告，然后与会人员自由讨论，并由评论嘉宾做学术点评。讲坛旨在打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科界限和专业界限，改变学科割裂的、封闭性的研究取向，建立一种开放性的、超越学科分野的学术交流模式。

2. 复旦高研院举行第十一期双周学术午餐会

2009年11月17日中午11:50,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 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第十一期学术午餐会。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系主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陈建民教授担任主讲嘉宾,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系主任助理成天涛副教授应邀参加学术午餐会。本次学术午餐会由邓正来教授主持。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郭苏建、林曦、刘清平、吴冠军、孙国东、陈润华、沈映涵等参加了此次学术午餐会。



邓正来教授首先代表高研院向陈建民教授和成天涛博士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并为两位嘉宾简要介绍了高研院概况和目前的研究方向, 接着, 向到场的各位研究人员介绍了陈教授的基本研究经历和学术成果。

主讲嘉宾陈建民教授特别感谢高研院的这次邀请, 并围绕“对抗全球变暖”这一主题开始发言:

首先, 陈教授运用翔实的例子印证了气候变暖的事实及问题的严重性, 指出如果不采取措施, 许多城市例如孟买和上海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会全部或大部分被海水淹没。其次, 他以IPCC的Classification减缓方案的分类为蓝本, 详细讲解了各种方案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涉及的方案主要有节能和提高能效技术、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煤的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油气资源和煤层气勘探和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先进核能技术、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生物固碳技术和其他固碳工程技术、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技术等等。再次, 陈教授以碳捕获和封存技术为例, 对之进行成本分析, 指出其存在的优点和缺点。此外, 还提及了北极造冰法、编织“激光网”、堵塞臭氧空洞、地表反射法、人造火山给地球降温、平流层喷雾法、造林法、强化风蚀法等等。最后, 陈教授从现实与梦想的角度指出我们的家园已经面临着剧烈变暖、污染加重等极其严重的问题, 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对我们所有的人而言都已经无法逃避, 他寄希望于中国能继创造新的经济之后创造出的环境。



嘉宾成天涛博士指出全球变暖是一个总体的、平均的趋势,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事实上有些地方恰恰是变冷的, 这个趋势带来的最主要的是能源和水源的问题。就政策控制来说, 现在我们国家在政策治理上还有所欠缺, 需要进一步的调整与提高。就操作实施来说, 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具体步骤与方式还有待细化。而在这一系列过程中, 我们以往的许多看法, 包括视甲烷为温室气体等等, 是存在问题的。科学判断本身、形成判断的机理以及判断带来的指导作用, 这一系列因素是相当复杂的, 值得深入挖掘和研究的。

诸位研究人员从生活方式、政治活动、国家战略、公众教育、全球秩序、立法措施、反思西方工业化发展模式、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关系、国家主权、国际法

的效力、成本控制、对人的认识和定位等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许多问题，主要包括：是不是可以从根本上破坏二氧化碳的结构？中国的科学主义是否缺少对不确定性的敬畏？为什么？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如何定位人类本身？如何理解环境问题的制造与受害分离的问题？仅注重短期利益可能带来的霍布斯难题，靠社会契约这一方式能否是充足圆满的解决？在强调各自民族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如何可能构建一个新的全球秩序？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发展模式以及减排问题有何看法？作为环境科学家而言，其身份认同和科学研究有何张力？经济发展最初是否考虑到环境问题，如果考虑到了，为何事实上没有采取兼顾的发展模式？等等。



陈教授一一详细回答了上述问题，着重强调了：第一，地球科学把影响气候的大气圈、生物圈、水圈、冰冻圈、岩石圈、地核、外太空等归结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问题，这一方法已经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第二，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较为欣赏，事实上许多国家并没有树立起责任意识，大家都认识到环境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就业压力问题放在一起是极其复杂的，却没有设计出特别好的协调方案。第三，环境问题与能源问题、动力问题进而与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这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不过就一般情况而言，新的技术代替旧的技术不仅解决环境问题，而且一定程度上将会带来新的经济效益。第四，科学精神本身追求的是创造性，不过人们在发展最初并没有也不可能预计到所有的可能性，历史的看，许多问题都是在其出现之后才被人们重视并逐步进行解决的。

邓正来教授对前述讨论做了小结，指出：其一，在应对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承认自己今天所采取的措施和所谓过去犯下的错误以及当年所认为的创造发明是有区别的，还是根本就是同一套逻辑支配下的行动，这是值得反思的。其二，人们行为的非整体性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各种国际协议的签约背后有一个整体性和一致性的预设，事实上由于民族国家等因素掺入，环境问题日益复杂，解决的进展并不迅速，这恰恰揭示出了人们行为本身的非整体性。其三，现代的政治制度安排，例如民主政治要求执政者要迎合选民的个别性意志，这将造成许多非预期后果。其四，绿色革命的本身的伦理性何在？现实的看，某些制度安排和知识性质是被巩固和加强了，对不确定性和非整体性的研究、对科技史的重新梳理或许是会帮助我们理清思路的。



本次午餐会学术氛围浓厚、讨论激烈，陈教授、成博士以及高研院诸位研究人员一直认为这种跨学科的交流十分必要，且已经有很大收获。这是继上次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杨新教授和刘平养博士应邀来高研院演讲之后双方进行的第二次交流，不同的学术视

角、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理论重点给各自学习思考带来了非常多的有趣的想法和启发，大家纷纷期待下一次更为广泛和细致的类似 workshop 的交流早日进行。

学术午餐会系高研院内部的学术交流活动。每双周举办一次，每次邀请不同学科的两到三位嘉宾，其中一名为主讲嘉宾。主讲嘉宾在餐前就某一特定主题发表演说，用餐时另两位嘉宾以及高研院所有研究人员对主题展开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学术午餐会旨在轻松的环境下，就同一话题，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学术对话，促进复旦大学跨学科同行间的学术交流。

3. 秦晖教授主讲“警惕‘问题殖民’：西学东渐中的问题误置”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二十）

2009年11月11日晚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辅楼102报告厅举行第二十场主题讲座。



本期讲坛邀请到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秦晖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和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任远教授担任评论嘉宾。



演讲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他首先欢迎秦晖教授来高研院演讲，简要介绍了秦晖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并分别介绍了两位点评嘉宾袁志刚教授和任远教授。

接着，主讲嘉宾秦晖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警惕‘问题殖民’：西学东渐中的问题误置——以‘大小政府’、‘交易成本’、‘中产阶级’、‘民族国家建构’等概念为例”的演讲。

首先，秦教授首先区分了“文化殖民”与“问题殖民”。在他看来，由于文化的差异只能从某种给予价值偏好的公共选择的结果中看出来，一味呼唤“文化殖民”会遮蔽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当下中国最紧迫其实是“问题殖民”，即将西方国家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误以为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其次，他提出了“今日中国人是否比今日美国人更能理解杰弗逊”的问题。他的回答是肯定。在他看来，当下中国与杰弗逊时代之美国的相似性可以让我们避免出现美国学术界的尴尬：左右派为争论杰弗逊究竟是“左派之父”还是“右派之父”而争论不休。在政治领域，今日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实现权责对应，而今日美国人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在权责对应的前提下选择大政府抑或是小政府。他运用“左公右婆”和“左佣右佃”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不同社会结

构当中存在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要素上的相似性不能遮蔽问题前提的差异性。

再次，秦教授分析了我国经济学界左右两翼对“交易成本”理论的误用。他认为，就交易费用理论而言，其适用的前提有两条：第一，交易费用理论是以承认合法交易权利不可剥夺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因此“降低交易费用”只能通过整合契约的自由人组织、而不能通过以强权剥夺人们合法交易权利、只许逆来顺受不许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达致。第二，所谓交易费用是全社会为进行交易活动付出的运作成本，不是交易一方付出的价格，不能把这个概念用来给单方面为某一阶层（尤其是强势阶层）行方便的做法提供理据。我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科斯的理论，但如果违反了这两条，那就是歪曲了这一理论，科斯是不能对此负责的。

最后，他又以“中产阶级”为例对中国学界的“问题误置”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按照欧洲历史进程而言，middle class指的是相对于欧洲过去中世纪两大阶层（农奴和农奴主）而言的一种中间等级；而中国传统社会是中央集权，存在着“上是皇帝、下是编户齐民”的“大共同体本位”状态。这样一来，从逻辑上讲，在欧洲，形成中产阶级是建立民主的条件；但在中国，建立民主是出现中产阶级的条件。

评论嘉宾袁志刚教授从经济学角度指出：第一，从方法论上来讲，学术国际化仅仅被理解为谈论国际的、他人感兴趣的、过于细微的问题，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内的、我们自己的、实质性的问题，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学者自身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第二，在迈向全球化和世界主义方向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问题可以归为三类：可以实证的问题，比如说经济效率或者说资本效率的问题；具备普适价值的问题，比如说福利、自由和人权等问题；与文化、民族、传统和历史等紧密相关的问题，它涉及特有文化的价值判断，不能以偏概全或笼而统之。第三，诚如秦教授所言，对于在宪政条件下的政府制度，美国人选择大政府模式，瑞典人选择小政府模式，这都是事实。不过就中国而言，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政府的责任和权力，社会保障的公平实施等问题，都蕴藏有极为复杂的因果和利益关系，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多角度的、综合式的研究。第四，就土地征用问题而言，如果土地的产权界定是模糊的，那么交易成本也就很难界定。事实上，经济学家多是从效率优先的角度，极力推动经济健康发展，本着对国家经济发展处于不同过程的判断，会强调不同的要点与因素，这所面向和将取得的是历史性的、阶段性的意义。第五，误用概念本身是一个问题，能否说明问题是另一个问题。若将中产阶级界定为中等收入者，那么如果一个社会发展成为橄榄型的结构，这在很大意义上将成为一个良性社会。



评论嘉宾任远教授从社会学角度指出反思文化殖民，我们对价值进行的判断要让位于事实判断，反思问题殖民，我们做事实判断时要结合实际，了解问题的真实所在；秦教授批评了乱用理论的做法，指出学术研究一定要结合

问题背景来进行，这是很到位的。

任教授着重指出：第一，不能因为理论错误运用就放弃理论本身，而是要继续寻求理论本身的内在理路和其中的正确观点；第二，不能因为理论错误运用而不能指导中国实践，就停止实践活动，而是要更为认真和积极地寻找正确的、符合问题背景的恰当而灵活的运用。

在此基础上，任教授提出了几点商榷意见：第一，区别于将责任和自由对立，政府是不是可能有更大的责任和更小的权力，同时人民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福利呢？人民的自由能否分担政府的一部分责任呢？第二，交易成本理论指的是产权明晰的市场交易，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那么集体农庄行为、推进国有化和加强工会组织当然就不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事实上，在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个农户组织起来，谋求合理的利益最大化，同样是降低交易成本，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第三，中间阶级的形成与自由市民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而且如果这一过程是有利于民主的话，那么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工业化、推动流动人口摆脱对土地的依附，当然就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结构向上形成橄榄社会，有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

秦晖教授在回应中主要强调了如下几点：第一，文化和价值的研究，如果要考虑到实证化的方法，考察作为价值偏好的文化，那么采用社会调查是较为有效的方式，当然对价值偏好的实证分析本身也是需要改革为之提供前提的。第二，明晰中国作为大责任政府这一判断的要点在于确认“责任”概念，即责任是在权利和义务对应的角度上来讲的，责任要求承担者不得不采取行动，权利则意味着可以不采取行动。第三，学术研究者当然是有动机和效果等问题的，学术研究本身也会产生社会历史影响。不过，更加基本的和更为重要的是符合规范的、遵守事实的、自洽严密的逻辑论证的问题，忽略了这一点，很可能就会使得学术研究的可能性不复存在。



主讲嘉宾回应结束后，在互动环节，听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说：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先在性，对于文化和价值，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出一个纯粹的自由选择？问题殖民的主体在哪里？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文化何以被视为是落后的进而成了应当被消灭的东西了？如何看待在中国境内外企里建立的工会组织这类问题？为何我们常陷入争论西方的问题，而没有发现真正的中国问题，您有何看法？就您研究的农民问题而言，您认为中国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基于目前的评价体系，如何防止您提出的问题殖民？您对民族国家建构有何见解？城市改建中常出现的钉子户问题如何解决？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您是否可以举出几个不存在问题殖民的例子？鼓励农民回到农村和加快城市化进程这两者是否是矛盾的？等等。

秦晖教授一一回答了听众们的提问，他强调：其一，若先搁置对实质平等的争议，形式平等的获得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其二，文化本身是没有优劣高下之分的，更多的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其三，西方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主权或者说王权、绝对权是针对国内的领主权和国外的罗马教廷的跨国教权，古代中

国不是一个领主制国家，阻碍人权成长的恰恰是不受制约的王权，因此在中国历史分析中要慎用民族国家建构这个说法；其四，理论上借鉴西方和针对中国的问题两者是不矛盾的，关键在于学术研究必须凸显出逻辑思维的重要性。

邓正来教授对全场讲座做了总结。他指出秦教授这场精彩而发散的报告蕴含了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第一，中国的学者在忽略西方思想的背景的前提下，把西方的问题误以为是中国的问题来讨论。但这是不是就是“问题殖民”？他认为，“殖民”带有一种隐秘的强制性，但中国论者对西方理论的误用毋宁说是中国论者“共谋”的结果。当然，知识有一个严密的生产系统，且与评价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的强制正是来源于这一整套制度安排，那么这又是如何形成且被不断巩固的？这些问题都是开放的，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第二，秦教授这里强调的是西方问题背后的思想背景，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那么这种思想背景本身的空间性因素是可以被悬置起来的么？中国人是像西方人那样去看国家、社会 and 政府的么？这是空间性本身带来的影响，是不能被忽视的。



本次活动反响极好，现场爆满，听众们或席地而坐，或站满全场。秦晖教授用词犀利、语言幽默、见解精辟，常常令听众们不由自主地为之鼓掌。

此外，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明明教授，新闻学院讲师沈国麟博士，高研院研究人员吴冠军、刘清平、林曦、陈润华、

孙国东、沈映涵等也参加了讲座。

4. Christopher J. Berry 教授主讲“亚当·斯密的道德经济学”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二十二）

2009年11月23日下午2: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二十二期迎来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Christopher J. Berry。Berry 教授是从事政治哲学及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 (Scottish Enlightenment) 的国际著名学者，曾出版 *Social Theory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1997)、*Human Nature* (1986)、*Idea of a Democratic Community* (1989) 等十余部专著。

本次学术讲坛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共同举办，讲座地点设在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博士主持。郭教授首先欢迎 Berry 教授来到复旦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演讲，并向到场的听众们介绍了 Berry 教授的学术经历及其主要研究领域。接着介绍了本次演讲的两位评论嘉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



院长、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方钦博士。



主讲嘉宾 Berry 教授发表了题为“亚当·斯密的道德经济学”的演讲。其演讲大致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主讲人讨论了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思想对商业或经济生活的批评，即把政治生活和积极参与公益活动视为比商业生活更具价值的事务。

第二，他勾勒了亚当·斯密对商业的辨析，澄清了斯密所论述的富裕和自由，并着重解读了斯密对正义和仁慈两种美德的论说。在他看来，对斯密而言，“正义则是支撑整个大厦的顶梁柱。倘若这顶梁柱被折断，人类社会这一庞大的组织……顷刻间便会土崩瓦解。”

第三，他纠正了人们对斯密思想存在的一些误解，诸如将斯密的经济学理解是为对自私自利本性的辩护，或者是把斯密的经济思想错误的解释为是对商业社会的“非道德化”。

第四，他讲述了斯密根基于社会互动和社会影响的道德哲学，这一哲学恰恰是建立在对其所处的商业社会的广泛批评之上的，凸现出的正是一个被彻底道德化的“自由”观念。他指出斯密在写作完《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之后进而着手研究道德情操（*Moral Sentiments*），这一事实正印证了我们对斯密思想的把握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入手：其一，从政治的或公民的角度看，斯密认为真正的公共善是建立在物质富裕之上，即富裕是好的（*Opulence is a blessing*）；其二，从一种宽泛的哲学角度看，对富裕的物质生活的解释正是对古典或基督教视角的拒斥。基于世俗生活对身体性欲望（*bodily desires*）的需求，一个拒绝永恒不变的规范性结果是接受现世可变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规定着世俗，斯密所宣称的作为世俗的“经济”是“道德的”。

演讲结束后，评论嘉宾韦森教授做了精彩的评论，

首先，李教授指出“*What government does properly, via the exact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s enable th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 to function (WN 687).*”按照亚当·斯密的这些论述，政府扮演了维护法律体系或法律制度（*legal system*）的角色，但是如果参照包括英国宪章运动在内的英格兰历史，不断有战争与革命，彼时政府被视作是



以按着长剑的罗宾汉为代表的强权组织，那么斯密又是如何看待这一政府形象上存在的张力的呢？其次，斯密认为道德情操（*moral sentiments*）是人性的一部分，那么如何看待斯密思想与康德思想的关系，特别是他们的不同之处？



评论嘉宾方钦博士指出斯密对于市场的论述对理解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如果我们承认道德是从市场中生发出来，并看到斯密对道德情操的论述特别强调社会背景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生存其间的社会若非如现代社会这般，那么我们的对相同性质的事件是否会作出不同的道德判断？事实上，道德判断因社会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在一个社会视为恶的或许在另一个社会当中被视为善，这涉及到道德判断的基础问题。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一矛盾？

Berry 教授对两位点评嘉宾上述评论做了回应。他指出：其一，斯密认为社会变革是相对缓慢的，商业社会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针对韦森教授的问题，他认为，当商业社会自发形成之后，法律和规则成为约束性力量，在英国宪章运动这一段历史中，包括君主及政府定位在内的社会结构经历了一系列变化，最终转变为现代商业社会的治理模式，这一转变中体现出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市场的规则与秩序问题是值得研究与讨论的。其二，针对斯密和康德思想的区别，他指出这涉及到斯密提出的“公正的旁观者”理论，恰如斯密所述是什么东西促使高尚的人在一切场合和平常的人在许多场合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呢？这不是人性温和的力量，不是造物主在人类心中点燃的仁慈的微弱之火，即能够抑制最强烈的自爱欲望。它是一种在这种场合自我发挥作用的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一种更为有力的动机。它是理性、道义、良心、心中的那个居民、内心的那个人、判断我们行为的伟大的法官和仲裁人”，斯密更强调的是人们内心的那个“公正的旁观者”。其三，就道德教育而言，Berry 教授将社会比喻为一个镜像，并举出人们在不同社会中会做出许多不同的选择，恰恰反映了社会规范的强大，但无论其多么强大，这并不能说明我们不应商业社会进行批评，相反地，需要看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进一步讨论和批判商业社会存在的逻辑。



主讲嘉宾回应结束后，听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如：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否与亚当·斯密道德经济学理论相关？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道德水平的直线下滑这两个现象间形成的反差是否是正常现象，何以同时提升经济水平和道德水平？如何应对风险社会理论对斯密理论的挑战？就“公正的旁观者”，中国存在天地人的统一来保证经济生活的和谐，那么您演讲中不断提到的 spectator 具体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如果考虑社会和文化差异，在缺少世界语言的条件下，如何定位斯密的道德经济学？为什么斯密如此担心政府对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干预？等等。



Berry 教授一一回答了听众们的提问，他强调了几点：其一，依照斯密的理论，在实现利益的方式上，必须采取正当的或道德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经济和道德是统一的。理论上对之分析处理并没有遮蔽现实中的统一性。其二，处于同一社会背景下的各类人，通过社会交往与人际互动，运用情感和理性的巨大作用，同时也依照习俗和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平和正义。道德判断的个别差异性和社会整体呈现出的合规则与合理性是不矛盾的。其三，伴随着英语的日益普及，这一现象已然为我们理解斯密的道德经济学创造了前提条件，不过，现阶段更为重要的工作是不遗余力地就各个文化圈之间加强以问题为导向的沟通、交流和研讨。

最后，郭苏建教授对全场讲座做了小结，并再次感谢 Berry 教授来到复旦高研院演讲。

高研院研究人员林曦、孙国东、陈润华、沈映涵、邓正来等参加了讲座。

5. Gustaff Geeraerts 教授主讲“中国与新的多极秩序”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二十一）

2009 年 11 月 23 日晚上 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第二十一期迎来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Gustaff Geeraerts 教授。Gustaff 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学、中国问题、全球化问题研究，曾出版《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Dimension of Peace and Security, Democratic Peace for Europe: Myth or Reality?* 等著作。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了讲坛。首先，邓教授欢迎 Geeraerts 教授来到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演讲。他向到场的听众们介绍了 Geeraerts 教授的学术经历及其主要研究领域，并介绍了本次演讲的两位评论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任晓教授。

主讲嘉宾 Geeraerts 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与新的多极秩序”的演讲，首先，Geeraerts 教授讲解了多极化趋势的含义，指出中国业已成为了一支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即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独立经济体。除了经济以外，中国对全球秩序的影响还表现在军事力量及文化传播等方面。



其次，他指出这一多极化秩序伴随着差异，表现为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多样性。随着单极时代的终止，美国、中国和欧洲各自均在寻求未来世界秩序中的定位，这一定位将是多方面和立体型的。中国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全新的、增长性的角色，将为全球的和谐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再次，他分析了如何更好地理解正在发生变化的新的多极秩序。Geeraerts 教授借用结构现实主义（Waltz）和社会建构主义（Wendt）的理论成果，指出未来世界秩序建构受到以国家物质力量为代表的硬实力和以身份、价值、观念为代表的软实力的双重影响，并详细讲解了其提出的多极世界秩序的转变模型。

复次，他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特质的反思，特别讲述了陈志敏教授论述的中国的双重特质，并以此为参照对和谐世界和中国未来的国际政策等做了解读。

最后，Geeraerts 教授提出了下述问题与听众们一起讨论：“中欧双方面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一个包括中国特征的世界秩序何以形成？多极化和多边主义的关系怎样？未来的国际关系是冲突还是趋同？”等。



评论嘉宾郭苏建教授指出,就世界秩序新发展而言,以往的世界秩序总是由某一个“中心”(hegemonic power),帝国或民族国家,所主导的。随着苏联的解体,一度出现了一个美国霸权的“单极世界”。但世界秩序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世界正向多极化、多边主义、多元化、发展模式和文化多样化发展,虽然各种力量彼此竞争,但各种力量

在竞争中相互学习,相互兼容,共同发展。虽然中国增长速度在过去30年很快,增量也大,但不能夸大其现在的影响力,中国30年改革开放时间还短,我们的经济和经济体制,政治和政治体制还处于“转型”过程,具有过渡性、不确定性、中间性、阶段性和发展中的一些特性,我们的价值体系、文化体制、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断变化和重构过程还远未完成和定型,我们正处在上述各方面的巨大冲突、应变、调适、和变革之中。我们面临机遇,但更多的是挑战。我们在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等方面的不足和问题非常突出,这些都是我国生产力提高和经济未来可持续性发展所面临的重要制约因素。我国的外援总额只占GDP的千分之一,还比不上一些北欧国家(1%),我们的国力、军力、政治和文化影响力都还不足以影响世界格局的重构和进程。因此,我们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传播中的“话语权”还没有,我们的体制在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中还很无效。中国是一个双重身份的国家,城市与农村、发达与不发达、沿海与内地差距等各种因素并存,对中国这个后发起国家而言,发展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和挑战。

评论嘉宾任晓教授指出:第一,如果我们能较快地从发展中国家成功转型为发达国家,固然可喜,但必须要追问的是这一转型背后的现代性问题,其根源和机制是要进一步分析和讨论的。第二,我们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同于先进国家,但是我国评价自身发展依照的是GDP、PPP等数据标准,那么这一表述和定位是否是充分的?第三,2009年伦敦G20金融峰会试图主导全球经济秩序,并挽救全球金融危机以建立新的金融秩序。诚然,我们要关注其提出的具体措施,但更要关注这些措施背后的用意和目的,防止重蹈覆辙。第四,随着中美合作的深入,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会更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因素将不被考虑。整体趋势将在各个国家的博弈中逐渐显示出来,这一点当然需要靠时间来验证,但简单的谈论所谓中美两支力量



(G2)将遮蔽我们对世界大趋势的预见和关照。



Geeraerts教授对上述点评做了回应,强调正如两位评论人所言,在世界秩序的类型过程中,中美两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作用值得进一步考察。

听众们谈了本次讲座的体会,并提出了一些质疑:在世界秩序的建立过程中,物质性力量和社会因素的作用分别是怎样的?现实性的功利性的考虑是不是最必要的?中国文化对未来其世界地位上的影响是怎样的?如何看待中美两国领导人此次在北京的会见?如何看待国际政坛提出的所谓 G2 和 G4 这两个概念?演讲中所提到的原有力量和上升力量之间的矛盾确实存在,那么美国是否会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等等。



接着, Geeraerts 教授一一认真回答了听众们的提问,指出物质性力量和社会因素两者在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其背后是有一套逻辑的;冲突和危机的确存在,不过,一定程度上合作共存将是更好的解决办法。

最后, 邓正来教授对全场讲座做了总结,用可想、可说、可做三者之间的张力概括了中国智慧,并指出世界秩序是在不同智慧与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中一步步形成的,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高研院研究人员吴冠军、刘清平、林曦、陈润华、孙国东、沈映涵等也参加了讲座。

5. Luk Van Langenhove 教授主讲“为提升社会科学与社会的相关度而迈向一种新的关于社会科学的本体论”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二十三)

2009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3: 00,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二十三期邀请到了鲁克·范·兰根霍夫(Luk Van Langenhove)教授。Langenhove 教授是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联合国大学 UNU-CRIS 项目主任,他长期致力于社会科学本体论和认识论



研究,在社会科学理论、定位理论、区域治理问题等领域颇有建树。

本期讲坛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邓正来教授主持。邓教授首先向听众们介绍了主讲嘉宾 Langenhove 教授,以及两位评论嘉宾:联合国大学特聘教授、比较区域一体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宋新宁教授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

研究人员吴冠军博士。

演讲开始前,邓正来教授还代表高研院向 Luk Van Langenhove 教授颁发了高研院学术委员的聘书。

接下来,Langenhove 教授做了题为“为提升社会科学与社会的相关度而迈向一种新的关于社会科学的本体论(Towards A New Ontology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In Order To Make Them More Relevant For Society)”的主题演讲。

在本体论这一基础性问题并不热门的今天, Langenhove 教授指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不仅关涉到客观物质世界 (the material world), 而且关系到社会领域 (the social realm), 为了激活社会科学研究, 开启崭新的路径, 对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是极为必要的。

首先, 他探讨了客观物质世界的本体论, 指出欧几里得的空间观、牛顿的运动观和因果关系的休谟模型这个三个理论架构组成了古典自然科学的本体论参考坐标。并详细讨论了 Rom Harré 区分客观物质世界三领域的理论, 领域一是实际经验的对象组成的, 领域二是可能经验的对象组成的, 领域三是由超越所有可能经验的对象组成的。Langenhove 教授还举例说明, 即依照现代物理学, 我们看到的星星事实上并不存在, 可见我们的感官并不仅仅适合于严格意义下的牛顿时空观下的经验, 进而有引入第四领域的必要, 这一领域是由实际经验的表面上的或想像中的对象组成的。



其次, 他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考察了社会世界诸领域, 强调了以下几点: 从实证主义者到社会的推论概念、首要的社会事实、定位、对过往事实的重构、社会图标、第二社会事实, 从而指出言语行动理论对社会领域本体论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即话语行动应被看做是社会和心理世界的本体。

最后, 他指出社会科学如果将人和机构描述为被动的机械的信息接受者, 那么这其实是另一种物理科学或因果科学。物理实体和人类的一个巨大区别在于后者有目的 (intention), 仅以事件因果链的方式看待人本身, 无疑是将人简单化为物, 而且, 更为重要的是, 对社会科学家来说, 还需要看到一部分心理学家寻求人们习惯背后的原因, 却忽视了人们能对其行动构建含义这个基本问题。



评论嘉宾宋新宁教授做了精彩点评, 首先, 指出 Langenhove 教授所从事的本体论研究在社会科学界并非主流, 但是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研究, 对于认识社会事实及其机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过, 理解社会领域的问题比理解自然领域的问题要更为复杂, 涉及到历史与传统文化、生物学、地理学等多种因素, 那么问题是是否有社会领域的普遍理解? 如果社会科学提供这一理解, 那么其正当性何在? 真实世界和社会科学营造出的社会世界的区分造成的矛盾与冲突如何得到解决? 两个世界的关联性何在? 其次, 宋教授提出了自己关于 position theory 的看法, 特别是制度问题本身在中欧两个话语系统中就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要想明晰思路首先要追问的就两个话语系统的共通处何在? 最后, 宋教授针对 Langenhove 教授演讲中涉及到的 tradition 概念提出了追问: 关于越来越重要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所营造的精神世界的存留问题, 您如何看待?

评论嘉宾吴冠军博士的学术点评侧重于社会科学外围的一组预设, 关心的是社会科学向何处去的问题。第一, 诚如 Langenhove 教授所描述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的意义关联越来越间接, 这一现象和



趋势在中国学术界也存在，Langenhove 教授试图将社会科学与人们所处的社会营造出更紧密的关联，这是很有意义的。第二，Langenhove 教授曾撰写 *Innovating the social sciences: towards more useable knowledge for society* 这本书，并将“有用性”提升到一个根本性的向度，这与作者试图跳出制度机制的初衷是有冲突的，在一定意义上没能跳出社会科学的这一根本性路径。第三，吴博士讲到了 Leo Strauss 提倡的“隐微写作”、刘小枫教授的《真理为什么要秘传》、学术黑话、哲学火药桶等问题，指出当今的学术任务是要否思和再思社会科学（*unthinking and rethinking social sciences*），并在此基础上阻止思想学术研究的彻底社会科学化。



Langenhove 教授做了回应：他对社会科学本体论的讨论事实上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科学本质的讨论，试图回到西方传统意义对本体论问题的重视，当然，这一点和现象学运动要求的回到事物本身也有关联；更为必要的是，处于社会生活当中的每个人都会讨论社会科学的问题，关注社会规则的运行问题，这一点是与自然科学相差极大的。

听众们对这场极富思辨色彩的演讲提出了许多问题：基于 fact、reality 和 truth 的区分，社会科学是如何在其独立研究下获得社会真实的？或者说社会科学在离开数据的支持下如何可能？您如何评价哈贝马斯立基于言语行动理论的沟通行动理论？您将言语行动作为社会科学的中心，这一方式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的反思性行为？如何理解美国哲学家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所谓认识论上强调自然科学化、本体论上否认不变的本质这一理论倾向？等等。



Langenhove 教授认真回答了听众的提问，主要讲了以下几个要点：对现象的描述会有很多种，其间可以分为不同的领域，这一区分会带来真假的问题，但后者并不是最优先的问题；除了数据真实性的问题外，我们对数据的理解方式也是值得深究的；反思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划归在言语行为的范畴之下，其内在概念运用机制有相通的地方。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全场讲座做了总结，指出 Langenhove 教授理论出发点针对的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这一理论倾向，背后隐藏了对物理世界转向甚至囊括了生活世界的批判，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回到社会生活本身。Langenhove 教授通过言语行动试图从物理世界回到社会生活世界，强调对社会科学否思（*unthinking*）和反思（*rethinking*）的重视，其间有充分的分析与论证，但它事实上却导向了另一种本质主义；而且如果不对言语行动注入批判性因子，那么他就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的否思与反思不同，会在一定程度上丢失社会科学的批判性。

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郭苏建、林曦、沈映涵、刘清平、陈润华、孙国东等也参加了讲坛。

三. 学术来访

1.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Andrew MacIntyre 教授一行来访复旦高研院

2009 年 11 月 3 日上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ANU) 亚太学院 (College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院长 Andrew MacIntyre 教授、中国研究学院 (the ANU China Institute) 院长、澳大利亚前驻上海总领事任格瑞 (Richard Rigby) 博士及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 (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 的 Brendan Taylor 博士等一行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以下简称“高研院”) 进行学术访问。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会见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一行。双方就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中澳关系、中美关系、澳洲中国研究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并就高研院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以及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学院进一步的学术合作进行深入的商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任晓教授, 以及高研院的专职研究人员林曦博士参加了此次会议。

附来访学者简介:

Andrew Macintyre: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亚太学院院长, 亚太地区国际关系问题专家, 曾受聘为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 比较政治经济学、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学、东南亚政治、澳洲外交政策等。

任格瑞 (Richard Rigby):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中国研究学院院长, 澳大利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曾任职澳大利亚外交部, 先后担任过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馆总领事以及澳洲驻伦敦及以色列大使。主要研究领域为: 中国问题、亚太问题等。

Brendan Taylor: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讲师, 研究领域为: 东北亚防务、美国外交、结盟政治等。

2. 莱斯大学 Steven W. Lewis 教授来访复旦高研院



2009 年 11 月 6 日上午, 莱斯大学 (Rice University) 赵廷箴与怀芳亚洲学术研究中心 (Ting Tsung and Wei Fong Chao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副主任 Steven W. Lewis 教授专程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以下简称“高研院”) 进行学术访问。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会见了 Steven W. Lewis 教授。双方就能源与全球化、跨地方治理 (trans-local governance) 与环保政策以及广告媒体与公共空间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商谈。高研院的专职研究人员林曦博士参加了此次会议。

附来访学者简介:

Steven W. Lewis: 获华盛顿大学政治哲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职于罗切斯特大学及上海社会科学院, 现为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Baker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亚洲问题研究员, 及莱斯大学赵廷箴与怀芳亚洲学术研究中心 (Ting Tsung and Wei Fong Chao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 全球化, 中国问题, 能源问题与公共政策, 媒体与身份认同。

3.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校长帕特·沃尔希教授一行来访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与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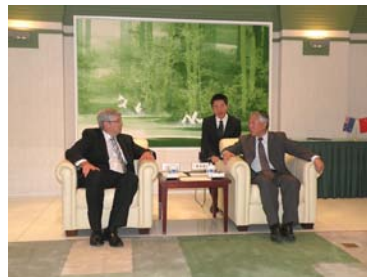
签署合作备忘录



2009年11月9日中午11:30,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校长帕特·沃尔希教授一行来访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以下简称“高研院”) 学术顾问秦绍德教授会见了沃尔希教授率领的代表团, 并出席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与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合作备忘录签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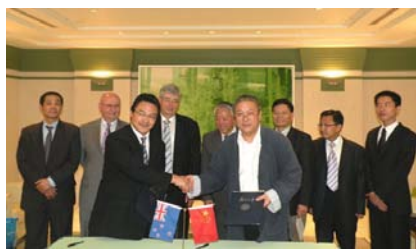
仪式。

秦绍德教授向沃尔希教授介绍了我方出席代表: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 复旦大学外事处处长陈寅章教授, 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任远教授,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林曦博士担任此次会议的同声翻译。



沃尔希教授向秦绍德教授介绍了一同来访的该校国际事务副校长罗伯·瑞贝尔教授和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教授黄晓明博士。

秦绍德教授对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校长帕特·沃尔希教授一行表示热烈欢迎, 并向沃尔希教授详细介绍了复旦大学的悠久传统, 特别强调了复旦大学专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研究, 与世界许多著名高校建立了广泛的校际交流, 并希望能与维多利亚大学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 进而对大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开展深入研究。秦教授希望以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共同开展的学术研究为一个纽带促进两校之间的合作。



沃尔希教授感谢复旦大学周到的安排, 十分赞同秦绍德教授提出的合作理念和思路, 希望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合作备忘录的签署能给两

校间合作的开展带来新的机会。



接着,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举行了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黄晓明主任和邓正来主任代表双方签字,双方校长及其他参会人员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最后,邓正来教授为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晓明教授颁发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证书。黄晓明教授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颁发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证书。整个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四. 学术出访

1. 郭苏建教授出席中联部举办的“后金融危机时代: 发展模式的改革与竞争”

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



2009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德国卢森堡基金会在北京联合举办“后金融危机时代: 发展模式的改革与竞争”国际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郭苏建博士应邀参加并作主题发言:“后金融危机时代: 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思考。”

中联部研究室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军主持了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中联部部长助理、当代世界研究中心高级顾问郭业洲和德国卢森堡基金会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米歇尔·布里博士在会上分别致辞。

来自中联部、中央编译局、中国高校和学术机构以及德国、美国、日本、印度、新加坡等国的30多位参会专家和学者集中在以下四个议题上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中国模式改革走向”、“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及其未来走势”、“近年来欧洲模式改革的回顾与展望”、“金融危机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走向比较”。

郭苏建教授的主题发言旨在回答以下问题:对“中国模式”应如何概括?它的特点是什么?与“美国模式”、“东亚模式”等有什么不同?“中国模式”

的国际影响力如何？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我们的中国模式应有什么调整和发展？在谈到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我们的中国模式应有什么调整和发展时，郭苏建教授认为，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国内不少民众和学人开始重新思考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特别是美国的模式，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他们的模式的问题，也提醒了我们西方模式对于中国的不适应性，并证明我们国家能力对于调节经济和稳定经济秩序的有效性。这里涉及到我们对“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国家主义”的基本评判。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上世纪 30 年代开始的论战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事实证明：经济自由主义不是“万灵药”，经济国家主义也不是“灵丹妙药”。重要是在两者之间如何取舍、如何平衡、如何整合各自的优势，趋利除弊，不断创新。

近些年来，哈耶克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很大，在批评计划经济的弊端和推进市场改革方面无疑是切中时弊，有其卓越的洞见。市场被历史证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机制，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是有效的。但是，市场也有它的局限性。过分迷信市场的作用，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市场会失灵、市场有弊端、市场会有害，政府的适当干预和调节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必须的。而且，市场并不适用于一个社会的各个部分和领域。比如，市场的功能是经济效率，而政府的功能是社会公正。市场无法做到社会公正，这方面就得由政府来做。市场的原则更不适合于政府。市场要求每个参与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府行为必然危害社会公正和公共利益。这是中国模式应当调整和防范的方面。

然而，我们若由此过分强调国家的作用，崇尚经济国家主义，则是一种误导。我们不能忽视这么一个基本事实：我国 30 年来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现代化成就并不是在不断强化国家的作用和不断集权化中取得了，恰恰相反，是在不断分权、下放权力、不断市场化中取得的。市场已被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和世界经济史证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机制，价值规律和竞争原则具有一般性的意义，我们不应一味地排斥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划分“西方的”和“东方的”。这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条件下思考中国模式和发展道路应警惕的倾向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最大启示就是：市场和国家有各自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现阶段，我国的市场发育和各种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政府的调节作用不可或缺，特别是政府在社会公正和公共利益领域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过去政府这方面的功能事实上是被弱化了，政府的商业化行为却扩大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过分强调或不恰当地夸大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和调节作用，崇尚经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背离我们经济改革的大方向。

另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投入和运作及各资本要素是私人控制的，为了私人的资本和财富积累。我们国家的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和战略产业的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银行，不可私有化。如果我国的这些国有资产私有化了，我国的经济最终难免受到国际金融资本寡头和大的“金融黑客”所控制和操纵，我们将无法抵挡类似全球金融危机的袭击和危害，并有可能像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那样逐渐地被西方金融寡头所肢解、吞并或成为其附庸。而且，与资本和金融市场由少数金融寡头的私人控制相比，我们国家对银行的有效控制和核心资产的拥有对于危机时期迅速救市和促使经济迅速复苏(jump start the

economy)有着较强的应对能力,并在主导国民经济发展大方向、集中有限资源解决关系国计民生急需和重点工程、解决社会需求和提供公共品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优势。但是,这不应影响我们经济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经济市场化要进一步推进和深化,要进一步学习西方银行和金融业先进管理和资本运作经验,对非国家关键产业要进一步推进民营化,并在各方面(特别是资金和政策方面)加大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和服务意识,尊重和发扬民营企业企业家精神,从而提高我国经济生产率、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总之,我们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现阶段是有效的,应坚持基本原则和特征,处理好市场与国家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和发展这种模式。

2. 高研院参加“东方现代文化观念创造及其对全球的影响”国际高层

思想论坛

2009年11月13-15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中心、《哲学研究》编辑部、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主办,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协办的“东方现代文化观念创造及其对全球的影响”国际高层思想论坛在西子湖畔的柳莺宾馆举行。作为协办单位,郭苏建教授、吴冠军博士、刘清平教授、沈映涵博士、孙国东博士、陈晔老师和邓正来教授等一行七人参加此次论坛。其中,邓正来教授应邀在11月14日上午的开幕式上致辞,并于11月15日上午对整个学术研讨进行了学术总结。郭苏建教授主持了11月14日上午的讨论,并做了题为《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发言。刘清平教授和吴冠军博士则分别作了题为《论墨家兼爱观的正当内涵以及对社会危机的影响》、《如何在当下激活古典思想——一种德勒兹主义进路》的发言。



日本东京大学田仲一成名誉教授、韩国东国大学朴永焕教授、中国台湾佛光大学龚鹏程教授、海南大学张志扬教授、同济大学陈家琪教授、厦门大学陈嘉明教授、南京大学顾肃教授、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武汉大学昌切教授等数十位余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11月13晚,邓正来教授还应邀做客浙江工商大学“名家讲坛”,为该校师生带来了题为《读书与读书人的使命感》的学术讲演。

3. 纳日碧力戈教授在贵州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演讲

一、纳日碧力戈教授主讲“民族共生与国家建设”

2009年10月29日下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在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三楼会议室做了题为“民族

共生与国家建设”的学术讲座。讲座吸引了来自贵州民族学院、贵州财经学院等高校一百余名师生的参与，其中不乏非民族学专业的学者。

纳日教授以“理论准备”为开端，提出三个论断：

- ①“当今时代是一个‘过程’与‘无因果’时代”；
- ②“当今时代是一个由‘二’生‘三’的时代”；
- ③现在的人文社会研究要从“文化”、“历史”、“权力”三个方面入手和评估。

并由当代著名人类学大师萨林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哲学家皮尔士等人的理论阐述开来，为自己的论断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随后，纳日教授漫谈了“民族与族群”、“共生与多元”、“以国统族、以文统国还是以族统国”等几个话题，讲述了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流变中的多元与共生关系，并指出我们要承认我国的民族现状、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习惯，互相宽容、互相支持，以平等的心态处理民族关系。

来自不同专业的研究生纷纷就自己关心的问题与纳日教授做了轻松愉快的互动，两个小时的讲座在意犹未尽的高涨情绪中取得圆满成功。



二、纳日碧力戈教授主讲“二元对立与三元过程：心智——肉身的置悬与圆融”

2009年11月10日晚，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在贵州大学做了题为“二元对立与三元过程：心智——肉身的置悬与圆融”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贵州大学文化书院主办，地点设在在贵州大学花溪北校区中国文化书院勉学堂。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龚晓康博士主持了此次讲座。

讲座主要围绕三个内容展开，即“符号：四哲的起源”、“相关研究的联想”和“中国经验”。

首先，纳日碧力戈教授就“符号：四哲的起源”做了详细的说明，并列举了亚里士多德的“灵魂之感”、奥古斯丁的“体感——认知”等多个事例。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明白相关内容，纳日碧力戈教授举起桌上的矿泉水并说到：“我们所说的符号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物代替一物。假如，我说这个水瓶是我，这个水瓶代表我，那么，你们见到这个水瓶就会叫它纳日碧力戈了。”浅显幽默的事例清晰展现所讲内容含义的同时，也增加了现场的气氛，现场笑声不断。

在活跃的气氛中，纳日碧力戈教授又列举了各种生动事例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说明了“相关研究的联想”和“中国经验”两大主要内容。

随后，讲座进入了提问环节。在此环节，同学们都积极踊跃的进行了提问，纳日碧力戈教授一一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解答过程中，在场学子们被纳日碧力戈教授渊博的学识和精彩的讲解所折服，掌声如潮。

三、纳日碧力戈教授主讲“民族生态与多族共和”

2009年11月13日晚，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在北京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文华楼西区

0406 教室举办的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系列讲座之“民族生态与多族共和”发表主题演讲。

纳日碧力戈教授以“多元一体时代，制度生态时代，人们如何相处和如何互相尊重”为主线，进行了精彩的讲演。首先，他阐述了“民族”一词无译的观点，并对不同情境下的“民族”进行了英文翻译；接着通过“以国统族”和“文化统国”的对比，提出“以国统族”对国家民族的发展更为有益的论点；最后，他分析了制度生态庇护下的多元生态类型，提出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去单一化的构想，并对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互主性”重点关注。

演讲中，纳日碧力戈教授妙语连珠，使在场师生大受启发。老师学生积极提问，会场互动氛围热烈。

4. 邓正来教授参加“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学术研讨会

2009 年 11 月 21-22 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了由上海师范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联合主办，上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重点学科承办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学术研讨会。邓正来教授应邀担任了会议第一单元“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一般理论”的评议工作，并积极参与了会议的讨论。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复旦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 20 多所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会议围绕“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这一主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

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五. 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

1. 复旦高研院举行第二次“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

2009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晚上 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在光华楼东主楼 2801 通业大讲堂举行第二次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本次读书会阅读文本为：[加]贝淡宁著《超越自由民主》，李万全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了读书会。

读书会由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研究人员林曦博士担任主报告人，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研究人员陈润华博士和吴冠军博士担任主评论人。

主报告人林曦做了题为《自由民主，我拿什么来超越你？——评贝淡宁〈超越自由民主〉》的报告。



首先,他认为贝淡宁对自由民主的分析是根基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但其对自由的讨论忽略了东亚社会的语境,是不完整的讨论。其次,林博士指出贝淡宁将春秋战国时期的体育教育和古希腊时期的体育教育作对比这个做法隐含着一种预设,即由“民主的核心就是民众参与”推论出对民众进行政治教育,使之成为合格的政治公民与能发挥能动性的政治主体。再次,林博士认为,就中国而言,可以从权力制约的角度来讨论民主,这涉及到中国古代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安排和一整套强调“德行”、“仁政”与“天命”的道德学说等等。最后,林博士认为讨论中国自由民主的问题,除了考虑语境的选择和历史问题如何进入研究视域这两者之外,同样不能忽略革命这一维度,特别针对体制建制问题,指出超越自由



民主不仅是一个学理讨论,而且是一个实际的政治操作。

主评论人陈润华主要讲了两个要点:第一,他解读了封面上自由女神手握《论语》这幅画,指出贝淡宁此种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写作,事实上是从西方民主的意义上赋予其所设想的东亚式民主以一定的合理性,尽管这一合理性是外在于那个本身的,其试图提出和解决的是东亚的政治生活如何被西方的政治生活和理想图景所影响这个居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问题。第二,就洞见和知识的关系指出所谓超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群主义或自主主义式的超越,其内在机理均是对人的西方意义上的定位与解读,另一种是哲人式的超越,跳出了虚幻的人性的限制,追求的更为根本的是精神意义上的真实的价值超越。

主评论人吴冠军做了题为《哇塞,这是东亚价值!——评贝淡宁的〈超越自由民主〉》的点评。首先,他从贝淡宁的治学路径谈起,指出其社群主义立场在理论和日常生活实践中均有表现,我们要看到其研究更多的印满了个人风格。其次,指出撇开理解的程度问题,贝淡宁其书只是在东亚政治方式进行解释,利用地方性知识为既有事实提供论证与支持,并没有对自由民主进行严格的界定与细致的分析,进而也没有提出任何规范性的方案,其实质结果就是没有超越自由民主。最后,当下问题的关键在于拿什么来超越自由民主,在于如何开放出具有普遍主义指向的古典思想。吴博士认为运用德勒兹对思想文本的解读方式的学术研究,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对自由民主有一定的批判性诊断,激活生命世界“丰富的资源”,并以独特的智慧来回应当下自由民主全球化时代中的各种实践性困境。



邓正来教授对上述发言做了评论。他指出:其一,林曦博士针对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拿什么东西来超越现在西方既有的自由民主;就超越的可能性而言,他提出的语境问题、历史问题进入研究视域的方式和中国革命维度等方式。吴冠军博士纠正了贝淡宁研究中的种种基础性错误,点出了建立规范性研究和内在普遍意义解读思想文本这一研究路径的重要性,强调了中国古代思想家从群这个角度揭示出人类实践世界的智慧,值

得深入挖掘。陈润华博士的评论则指明了上述两点开启了对现存问题的研究，但也并未解决这个超越的问题。其二，贝淡宁所论东亚并非个殊，而仅仅是西方自由民主的例外。然而，任何从个殊性揭示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简单的对个殊性本身正当意义的证明，而是要做到试图揭示出来的价值可能比另一普适方案更有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超越自由民主的问题是一个极具开放性的重要问题。

接着，姚选民、孙国东、刘依平、沈映涵、沈国麟、龚智慧、王升平、谢亮、李新安、陈媛等其他十位报告人依次做了八分钟发言。随后，大家就以下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将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区分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是否涉及了更广泛的问题？在后冷战背景下，以功利主义的目标和标准看待东亚价值是否具有政治哲学上的可欲性？中国古代的友道和孝道究竟是什么？如何来理解“性相近，习相远”？贝淡宁要解决的问题是谁的问题？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要谈论超越？等等。



本次读书会是高研院举办的第二次跨学科读书会，学术讨论争辩激烈，前后进行了三个多小时。读书会分为报告评论和自由讨论两个环节：在报告评论环节，主报告人、主评论人和其他报告人依次发言，然后由邓正来教授点评；自由讨论环节，每位在场的同学和老师都可以提问，主要针对的是主报告和主评论文章中涉及的问题展开讨论，提倡积极的学术批判。

六. 慧园鉴赏会

1. 复旦高研院举办第一期慧园鉴赏会

2009年11月20日晚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办第一期慧园鉴赏会。鉴赏会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

本次鉴赏会以电影为主题，选取了“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这部影片为鉴赏对象，该片导演是美国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片名还被译作未来报告或关键报告。影片着眼于公元2054年美国社会存在的犯罪和预防犯罪、正义和非正义、纯粹和混杂、理性和非理性等种种矛盾与张力，呈现出现代社会技术、计划、规训和人性的各种缩影。



观众们从命理学、因果关系、柏拉图主义、父子亲情、夫妻之情、技术中性、目的和手段、思想控制、社会管制、理性中心主义、现代性执着、大团圆结局模式等角度发表了各自见解与评价，并提出了很多开放性的问题，比如说：完美的计划体制是否可能？作为理性的人和作为生命情感的人之间有何关联？由于失去了形而上学和神学的存在对信仰的保证，那么人所制造的系统与人本身的斗争是否就成为了目的本身并永不停歇？终

极性保证缺失的背景下我们的方向在何处？为什么最后影片告知我们没有 Minority Report？为什么影片叫做 Minority Report？男主角对作为反面人物的警察局长提出的两个选择是什么？等等。

主持人邓正来教授做了总结，指出了影片提示出这样一条线索，即相对于人们经由历史似乎可以看到过去，人们本能性的想看见未来，诚然，从技术层面来说看到趋势是可以做到的，但人们很难看透人心及其真正的理路，往往在可以看到的选择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邓教授感谢这么多同学和老师来参加此次慧园鉴赏会，并欢迎大家下次前来，踊跃发表各自的观点与看法。



此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沈国麟博士和高研院研究人员郭苏建、沈映涵、吴冠军、孙国东、林曦、陈润华等参加了本次慧园鉴赏会。

附慧园鉴赏会简介：

人生天地之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的生命洪流依然环绕并贯穿我们的生活。人之为人，秉承天地之无限厚爱，唯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所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者，所谓独学无友者，所谓格物致知、观风理俗者，皆是要我们把目光投向无穷的远方，把胸怀装下古往今来；对祖先、我们和子孙，对天空、大地和人世，一样的尊重，一样的保持体贴、热爱。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令人回味无穷的生活方式，古代中国王家的礼乐教育，印度佛家僧团的讲座修行，希腊雅典学院的演讲辩论；去古未远，尚有村社私塾-书院-太学体系及道观、寺庙等研习智慧之所在，如今则是大学体系。

未来的世界将是什么，取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慧园鉴赏会意在以纪录片、电影、音乐、戏剧等为引子，对所有爱智者开放的论辩和批评，重新理解我们的世界、风俗和意义，学会锻造我们的著作、生命和敬畏。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举办的慧园鉴赏会未来每月将进行一次，欢迎大家前来参加。

七. 学术信息

1. “邓正来教授新著出版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学术研讨会”简报

2009年11月8日下午1:30，值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推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集十余年之力所完成的哈耶克研究成果（分为《哈耶克社会理论》与《哈耶克法律哲学》两部著作出版）之际，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



出版社有限公司、高研院共同主办的“邓正来新著出版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隆重举行。



本次学术研讨会分上下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由复旦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际

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林尚立教授主持，第二个环节则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贺圣遂先生主持。

首先，作者**邓正来教授**做了发言。他感谢这么多老师和学生参加研讨会，并特别感谢了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董事长、孙晶副总编辑、陈军编辑为两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劳。他主要就出版这两本书的缘由进行了如下三方面的解释：第一，从思想操练方面来讲，是想对自己从1994年以来一直从事的哈耶克研究进行一个小结，希望得到大家的学术批评。第二，从理论研究方面来讲，是因为哈耶克的理论中有许多必须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其一是哈耶克提出的无知观、理性有限与传统、地方性的 *nomos* 的关系问题。核心问题是：人的理性是否足以摆脱产生这种理性的各种条件并外在于这些条件对它们进行反思和批判是否可能？其二是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建构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政治经济秩序建构本身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即自由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化问题；知识的性质问题：知识是否具有“正当性赋予”的力量，即赋予某种社会性质以正当性？第三，这两本书以及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哈耶克读本》的出版也是对当下主流的、以集体性的运动方式进行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状况的一种批判。

接着，与会学者就邓正来教授“哈耶克研究”的特色、贡献和可以开放出的问题以及自由主义理论的一般性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典范”的邓正来教授“哈耶克研究”

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高研院学术研究顾问朱维铮教授特别指出：邓教授多年来围绕哈耶克进行的基础研究，这样一丝不苟的“十年冷板凳”的学术精神非常值得同道们学习，这一巧妙参照前人学术成果的做法也值得学人借鉴。朱教授还借用隋炀帝杨坚“我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指出自由在传统语境下常意味“由我自己”。但从所谓普适价值概念的角度来看，在中国比较早谈论的自由有：清末章太炎《馥书》中提倡培根所论之自由，梁启超在《论自由》等一些文章和书信当中基于传统文化缺少个人思考的权利，已经指明在承认自由和秩序存在张力的基础上，强调自由高于秩序、自由高于服从。



哈耶克研究专家、独立学者秋风（姚中秋）认为，邓教授的哈耶克研究代表了大陆、乃至整个中文世界的最高水平，树立了一种新的“学术研究典范”。他指出：邓教授深入到了哈耶克思想的最深层。他把哈耶克思想的核心逻辑揭示了出来，也许其中某些逻辑的链条式哈耶克自己也未必清楚意识到的；他开创的这种“研究—翻译”合一进路，树立了引入西方学术著作的典范。他最后指出：唯有以研究为导向的翻译，才能够使得译者超越原著，以原著为出发点，实现学术创新，把西方学术内化于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创造性生产过程中，而不只是充当外国学者的单纯介绍者。



北京大学人类学系王铭铭教授用了三个“不等式”进行了发言。第一，学历不等于学问。邓正来教授尽管学历不高，但丝毫不影响他学富五车。第二，邓教授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不等于他采取自由主义立场。他先后研究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规范化问题，布迪厄、哈贝马斯知识社会学理论，以及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等。他可能的目的是通过经典人物的研究建立走过学术研究的典范。第三，方法论个体主义不等于个体主义。问题是个体主义方法论如何在整体主义中获得定位。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结合最重要的渠道是等级主义，这一点于实质上很难绕过去，所以对等级主义的研究有待加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建军教授认为：自由和自由主义被民间和官方所接受，这一贡献与邓教授的哈耶克研究是密切相关的。自由主义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曾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些与邓正来教授 90 年代在香港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推进的市民社会研究引起的社会思潮相关，但是福是祸尚不明朗。关于自由主义，刘教授还指出，就西方传统而言，其 16 世纪所谓的自由同当下中国一样也似被理解为放纵、无视道德法则、宗教中的离经叛道；从哲学范畴来看，参照伯林所讲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会对我们的研究有很大帮助。从当前的社会经验事实来看，在政治学中，自由与人的身份结合在一起，自由意味着掌握自己的生活的能力，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有保守取向和精英取向，值得关注。



二、“邓正来式的哈耶克研究”？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讲师刘小平博士作了题为“哈耶克研究的两条线——基于邓氏‘哈耶克研究’的体悟”的发言。他认为，邓教授哈耶克研究的明线是突破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回归学术研究的开放性。他对哈耶克内在逻辑进行了整体把握，从其知识论、社会理论、法律理论和正义理论等几个角度出发详尽研究了哈氏理论；暗线是突破学术研究对象的一般性，加入研究者自身思考的特殊性”，即一方面以一般性的社会秩序问题为学术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根据中国直接指向社会秩序问题的核心，即社会秩序建构的正当性及其根据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指出：第一，哈耶克试图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一个整体性的百科全书式解释，以学术的态度来说，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需要对之进行全面研究。第二，邓教授在理论上不断地以西学的话语讲述中国的主体性问题，这既表明其思想中包含着某种张力，也表明当前中国的知识系统和情感结构深受西学影响，邓教授以其独特的方式在提醒我们要关注西学如何内在于中国的问题。第三，如何从中国问题出发，提

出中国人对西学的阐释。金融危机和中国语境为我们重新理解哈耶克对现代资本主义解释的提供了新的契机，值得深入挖掘。

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吴冠军博士认为邓教授的哈耶克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开启了思想研究的一种德勒兹主义进路。他认为，当邓教授尝试将哈耶克理论抽离其本身得以型构的历史语境与时代背景，而追索该理论本身的内在原创力及其所开放出来的理论问题，他就已经进入到了德勒兹主义的阅读视野中。他是最忠实的“哈耶克主义者”，因为他不看重该名号而致力于在意识形态外衣包裹下剥出哈氏理论内核。在发言的最后，他也对德勒兹主义阅读与另两种“反主流”阅读（施特劳斯主义阅读、德里达主义阅读）在学理路径上进行了对照分析。



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孙国东博士将邓教授哈耶克研究的问题期待性地概括为超越“新自由主义范式”的理论准备。他认为，只要结合邓教授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开放性全球化观等相关研究，我们可以管窥到他对哈氏理论的批判立场，也就不会将其标签为一个“哈耶克主义者”，进而将其纳入到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阵营中。他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予以批判的现代化范式与他在《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中予以反思的、以哈氏理论为主要渊源的“新自由主义”其实是一致的：前者实是后者支配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都为中国提供了一幅“西方理想图景”。因此，我们可以期待性地将邓教授的哈耶克研究概括为超越“新自由主义范式”的理论准备。

三、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影响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刘清平教授指出：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解读乃至逐句译读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在理路中，邓正来教授能够拨开某些西方学者对哈耶克的保守主义解释和效益主义解释的迷雾，指出他在哲学上陷入休谟非理性主义与康德理性主义之间的理论困境。他同时指出：尽管哈耶克自以为受休谟影响很大，其立场却更接近康德。因此，哈氏仍无法摆脱休谟甩给我们的那道难题：能不能以理性的有限性以及自生自发秩序的“事实”为基础，



推导出站得住脚的自由主义“价值”理念？怎样保证凭借这种自由建立的文明秩序不是一种自生自发地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以智诈愚、以上压下的文明秩序，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文明秩序？等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刘擎教授首先提出了自己的一个 puzzle：中国最权威的哈耶克阐释者和研究者邓正来教授为什么会出任复旦高研院院长并从事着一项高度计划性的 project？他认为，这涉及到如何理解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中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自发秩序并不是一种

整全性的描述，它既是一种描述性的秩序，即对那种就应对人类无知状况而言最好秩序的描述；又是一种规范性的秩序，即对无视自发秩序之人类行为的一种规范。自笛卡尔以降，人之意志（计划）就进入到秩序的构建之中。计划也内在于人类本性，因为人是具有反思性的，可以脱开现在的处境来构想未来；而哈氏所要指出的其实是：这种反思性受到当下情境和积淀在人身上的传统的制约。因此并非所有的计划都是要反对的，而是要看到这种计划是否受到相应边界的制约。从这个角度来说，哈氏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并不是二元对立的。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振华副教授立基于邓教授

《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一文，谈了关于个人主义的三点看法：第一，“集体的意志”的并不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则在政治创制上就蜕变为要求个体服从于一种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力量，在现实中这其实是要求个体服从于某种专制型的政治力量。因此，哈氏认为整体主义其实是政治专制主义。第二，哈耶克指出，一种将个体与其他个体割裂开来的原子式个人主义的实质也是政治专制主义。其理由在于，原子式个人主义要么走向无政府主义，要么走向对任何人皆为其所欲为之后形成的任何秩序的承认，这当然就是在主张一种弱肉强食型的政治专制主义。第三，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强调的是普遍联系之下的个人主义，人皆生活在社会之中，不能够脱离社会而存在，必须尊重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规则，也就是法治秩序。因此，如果说当下中国存在一种如吴敬琏先生所批评的“权贵资本主义”，这种情形的思想基础乃是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这恰恰是哈耶克反对的。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从经

济改革的角度谈了对邓教授哈耶克研究的看法：其一，我国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引入了市场机制，9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邓教授当时的哈耶克研究和新自由主义研究影响了其间社会思潮的转变。其二，就经济发展而言，国家和市场是两种不可互相替代的因素，当今由于新技术革命的持续进行，这两种因素的更大趋势将是融合，共同实现发展。其三，国际问题的中国视角

和中国问题的国际视角是相互补充的，以开放性的心态对二者的巧妙运用才能与西方实现更为广泛和实质性的对话，才是真正地保持学术的自主性。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洪涛副教授结合

自己1980年代因哈耶克受撒切尔夫人偏爱而对哈氏产生偏见的经历指出：学术有其自身永恒的价值，有在学统中自身的地位，而政策的后果是因时、因地、因人变化的。因此，对思想家的研究应当区分学术本身的价值与学术的政治影响，刘建军教授在前面讲到的“祸福”论值得商榷。对哈耶克研究应当主要着眼于其在学术脉络中的地位，以其政治影响做评判是不可取的。他同时对人们关于自由讨论的非学术性进行了批评。他以邓教授将哈耶克的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译为“自由



秩序原理”为例，论述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关于“自由”与“秩序”的内在关联及其在哈耶克思想中的体现。他认为，中国论者的讨论常常遗漏了这一点。

四、其他相关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林尚立教授在对第一环节进行学术总结时也谈了他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和自由的看法。他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生命意义的承载。人类社会一直有一个努力，即如何使一种生命意义的自由变成一种社会存在，进而有了许多的制度设计。基于这一前提，对自由问题的研究就出现了两个路径：其一，从本体的角度，从生命意义的角度进行研究；其二，从社会存在、社会

制度的角度进行研究。对哈耶克思想的研究可以从生命意义存在的研究转化为社会存在意义的研究，但这两个路径均会遇到矛盾：若从生命意义存在的角度进行研究，则会面临生命的有限性和精神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进而涉及情感、理性和无知等一系列问题；若从社会存在层面进入也会面临一个矛盾，即空间上的有限性和时间上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涉及到现实制度和未来理想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我们今天对邓教授哈耶克研究路径的探讨其实正是在厘清对自由和自由主义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

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哲学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教授指出：不仅对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有特殊兴趣的人们应该重视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有特殊兴趣的人们，也应该重视哈耶克的理论立场和学术研究。1944 年，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出版的那年，卡尔·波兰尼的同样尖锐批判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著作《大转型》也同时出版，并且至今仍被许多人奉为经典。



回顾历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从来也没有因为哈耶克的工作而偃旗息鼓。即使去年爆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似乎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失效提供了无可反驳的证据，而且甚至连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对放松对金融市场的严格监管是一大错误，但欧洲多数选民们却并没有把多数选票投向更重视市场监管和公共福利的中左翼政党，法国、德国甚至丹麦这样的国家，偏向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党派依然执掌大权。因此，究竟如何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仍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萧功秦教授指出：哈耶克思想提供了最好地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门径。自 19 世纪以来，中国人正是怀着中国人固有的定见与对自身困境的特殊关注，来认识自由主义并对其发生兴趣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也同样如此，我们国人把自由主义简单地理解为批判拒绝文化专制的道德主义工具；到了 90 年代与 21 世纪初，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解释，又发生另一种变化，那就是决策层或对经济决策层有影响的经济专家们，把新自由主义视为构成良序社会的普遍原理。但这些都忽视了中西社会结构构成原理

之不同：以分、制、禁、官、君这五要要素为基础聚结起来的中国社会，与西方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相比，是截然不同的社会构成模式。只要我们认识到异质多元社会与同质一统社会的结构区别放在心中，我们会自觉地克制把西方自由主义当作我们的教条的习惯冲动，我们会理性地意识到，当我们的社会并不具备异质多元个体社会结构时，我们就不应该教条地套用自由主义原则来作为当下改革的指导方针。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吴炫教授指出，邓教授的著作引发他如下思考：其一，哈耶克针对西方“由少数人的理性设计”所做的批判、以及对人们遵从的“自生自发的秩序”的重视，启发我们将儒家精英的“教化传统”与民间自发形成的习俗传统做分离思考，并将这种分离产生的张力作为中国现代制度的整一性来对待，调整单纯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制度建立之模式。其二，相对于儒家的长期教化对中国民众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内部规则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依附西方设计”之堕性，中国式的现代自由理论和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建设，同样不能放弃由少数人的创造性理性设计之努力。其三，吸取哈耶克的“理性批判——独特问题——观念生产”的批判范式，可能是包括邓正来教授在内的中国学者改变单纯的阐释西方理论的“理论要求”。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任晓教授首先表达了对邓教授严谨治学精神的钦佩，接着回顾了上世纪198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学说史。他认为，这期间凸显出两个根本性理念——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万能论。但这两种理念及其在实践中的影响表明：它们是失败的。这一事实促使我们进行反思，哈耶克的思想、特别是自发秩序的思想可以为我们提高某种借鉴。

五、总结性讨论与邓正来教授回应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借进行学术总结之际，也谈了他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看法：

第一，哈耶克这位西方知识界的边缘性人物是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位巨人，邓正来教授对哈耶克的研究深入其思想内部，堪称哈氏在当今学术界的知音。

第二，哈耶克的根本问题不是自由秩序，也不是自由（liberty），而是法治问题，即自由的界限是法治，在法律的限度内方可谈论自由。邓教授将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译为“自由秩序原理”有不妥，哈氏所探讨的其实是构成自由的一些原理。

第三，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其条件是抽象规则系统，自发秩序在其中可以增长，但规则并不能自发产生：作为追求规则的人，交往产生秩序，长久时间后，秩序演化为规则，进而成为习俗和惯例——在普通法下成为权利，大陆法系进而制定各种法条。



第四，韦森教授提出了“良性社会的基本规则和基本原理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更有必要弄清楚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原理，有必要梳理包括哈耶克在内的思想遗产。

第五，他也指出了邓教授在介绍哈耶克与维特根斯坦之间关系时的一个疏忽：按照英文原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 nephew，已经出了中国“五服”界限，而不是“堂兄弟”关系。



作为此次讨论的中心，邓正来教授对与会学者的精彩评论表示感谢，并对一些主要的评论进行了回应。针对童世骏教授提到的波普尔思想，邓教授指出哈耶克和波普尔均反对极权主义，但两者在无知观上有区别，波普尔认为无知是可以被趋近甚至克服的，哈耶克认为无知是无限的，是永恒的状态，是不能被克服的；针对刘擎教授提到的计划问题，邓教授指出哈耶克并不反对一般的计划，而是反对整全性质的，对社会制度带来变迁式的计划，反对的是在唯理主义支持下的制度设计等等。

在研讨会的最后，邓正来教授还对韦森教授的总结也做了简要的解释和辩护。首先，他认为哈氏区分了 law 和 legislation，就后者而言，他不仅反对大陆法学以成文法表现出来的 legislation，也反对普通法系以不成文法表现出来的 legislation。他所谓的 law 属于自发秩序的一部分。其次，关于《自由秩序原理》的译名问题，他回忆了林毓生和许倬云等先生对该译名的建议以及他说服他们的过程。译为“宪章”或“构成”有违哈氏的知识论、特别是他关于默会知识、实践知识的相关论述。



2. 邓正来教授新著出版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学术研讨会议程

2009年11月8日下午13:35—15:35

主持人：林尚立（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

作者发言（13:35—13:45）

邓正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发言人（每人限时10分钟）（14:45—15:25）：

朱维铮（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顾问）

刘建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清平（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哲学教授）

秋风（独立学者）

苏振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刘小平（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讲师）

吴冠军（复旦大学讲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
孙国东（复旦大学讲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
茶歇时间：15：25—15：40

2009年11月8日下午15：40—17：50

主持人：贺圣遂（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

发言人（每人限时10分钟）（15：40—17：20）：

童世骏（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哲学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许明（《社会科学报》社长兼总编）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吴炫（浙江工商大学西湖学者，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郭苏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政治学教授）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洪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学术总结（17：20—17：40）：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晚餐时间：18：30—20：30 地点：四平路2152号丰收日酒店

其他与会嘉宾：

桑玉成（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书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顾肃（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孙笑侠（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杨春福（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任远（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社会学教授）

潘天舒（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周智强（《解放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

张明扬（《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主任）

季桂保（《文汇报》理论部主任）

孙晶（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编辑）

陈军（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社科编辑组副主任）

姜华（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对外合作部主任）

陈润华（复旦大学讲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

林曦（复旦大学讲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

沈映涵（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